

復旦學人文庫

余开祥 编著

中国改革开放 与世界经济

——余开祥文集



復旦大學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余开祥 编著

中国改革开放 与世界经济

——余开祥文集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余开祥文集/余开祥编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7
ISBN 7-309-03268-3

I. 中… II. 余… III. ①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中国
②经济—研究—世界 IV. ①F121②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4417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86 千

版次 2002 年 7 月第一版 200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余开祥教授简介

余开祥,原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1922年7月出生于浙江江山石门镇。在衢州中学求学时,即以聪敏勤学、成绩优异,为师生们所称道。1941年高中毕业,考入当时迁至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两年后,因不满该校国民党的党化教育,转学复旦大学经济系学习。1945年毕业,留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至今已50多年。

他初在复旦大学新设的商科研究所(后改称经济研究所)工作,1945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青年民主同盟”,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曾担任学校工会副主席,并协助许涤新同志筹办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班,担任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1955—1957年,任马列主义基础教研组副主任和班指导教师。期间结合教学,编写出版《苏联第三个五年计划》等书。1956年被评为副教授,曾兼任过校图书馆副馆长。1960年调任复旦大学政治系副主任,1964年起,主持本校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常工作。20世纪50—70年代,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主讲过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政治学、世界经济专题等课程。教学中一贯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教书育人,注意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其间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丛书(1945、1946、1947、1948、1949年五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广泛搜集了第一手资料,较翔实地反映了第二次大战后世

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尤其是深入地揭示出西方国家外交政策制订的过程及谋略,对了解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情况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该丛书于1984年获上海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此外,还参与编写《战后帝国主义经济》、《西欧共同市场》、《美国政府机构》、《美国垄断财团》等书。

1980年余开祥晋升为教授,1979—1984年间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近十多年来他主要从事西欧经济 and 世界经济综合问题的研究,并为研究生讲授有关课程。在指导研究生工作中,强调打好扎实的基础,要求先有广泛的基础知识,再向专精方向发展;把研究世界经济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紧密结合,做到“洋为中用”;鼓励青年人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树立谨严笃实的学风。近十多年来,又编写了《西欧各国经济》、《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欧洲共同体:体制、政策、趋势》等专著。其中《欧洲共同体:体制、政策、趋势》一书是“六五”计划期间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之一,该书较深刻地剖析了欧洲共同体的组织体制和经济机制,清晰地指明了欧共体的性质、作用和今后发展趋势,是国内研究欧共体经济的一部有分量的专著,得到国内外的较高评价。《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一书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之一,该书根据当时国际政治经济情况,提出“资本主义在嬗变中,社会主义在试验中,发展中国家在探索中”及“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大业定能成功”等论断,立论新颖,分析透彻,材料丰富,文笔生动。此外,还参加了《世界经济概论》(1991年获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特等奖)、《经济大辞典·世界经济卷》、《世界经济百科全书·国际经济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等书的编写工作及《国防经济学》、《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商务辞典》(沪、港版)等书的校译工作。

与此同时,他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1979年、1981年和1986年发表的《对外贸易要有个大发展》、《欧洲货

币市场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的特点与我国的政策》、《关于我国对外投资的几个认识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资本市场开放,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等论文,阐述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积极开展对外贸易,走向国际金融市场,利用外国资金等观点。他还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撰写《对特区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认识》、《上海亟需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等文章及主持编写《国际大城市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等,提出特区要摆脱传统经济体制的影响,大胆探索宏观上有效控制、微观上搞活的新经济体制,上海要不失时机地加快改革步伐等主张及上海迈向 21 世纪应注意的一些战略考虑。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他参加国内外多次学术会议或活动。1980 年 8 月,他曾作为中国经济学家代表团成员,参加在墨西哥城召开的国际经济协会第六届世界经济学家大会,提交论文《中国现代化与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1984 年 10 月到联邦德国波恩参加欧共体经济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作了题为《80 年代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欧洲共同体》的报告;1988 年 9 月至 1989 年 7 月应邀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城欧共体主办的欧洲大学研究院从事欧共体研究一年。他先后被推选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理事,中国西欧经济学会会长,中国欧洲共同体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理事,中国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会长,中国欧洲学会顾问,上海国际贸易学会顾问等。他还长期兼任《世界经济文汇》主编、编委会主任、顾问。其姓名、成就被载入英国伦敦编著的《国际名人录》、《亚澳名人录》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等书。

(何 因)

为复旦世经所建设和发展 呕心沥血的掌门人*

伍贻康

余开祥教授比我整整年长 14 岁,是我的学术前辈和领导。自 1964 年 2 月复旦大学建立当时叫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起,他长期是我的“顶头上司”,但作为他的部下和小辈,我却一直习惯以“老余”相称,迄今已 38 年了。从称呼这一平常小事,表明余开祥这位老资格党员领导干部之平易近人,毫无架子的人品,证明他同我们这些小字辈之间的亲切平等关系。我一直很尊敬老余,虽然对他深知并不多,但对他的学问、品德和工作却从心底里敬重他。在我的粗浅了解、认识和记忆中,老余称得上是他这一代党员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的道德品行,是我们这些小一辈所敬仰的。我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20 多年的工作中,老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平易谦和,光明磊落,顾全大局,身体力行,无论在学术工作和社会活动中他总是认真踏实、细致入微、全面周到地做好领导交办的或他认为应该做好的工作。一个基层领导同志如此不事张扬,做了许多付出很大代价而旁人不尽知晓的事,更值得称道。

记得建所那段期间,老余并非正式的所领导,但作为所主持日

* 编者注:伍贻康教授 1988 年调离复旦大学,此后曾任上海市高教局常务副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兼职教授。

常工作的实际负责人,繁重的组织协调和学术指导工作都压在他身上,他带领我们28个人没日没夜地干得那么卖力,短短时间里拿出不少成果,做出明显成绩,为我所在全国高校国际问题研究重点单位中占据突出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方面老余是功不可没的。

当对老余来说可谓惨遭浩劫,差点陷于灭顶之灾的“文革”刚过后,他再度不计得失,重新担当起我所那特有的无名有实的负责人,直到1979年他才名正言顺正式被任命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此后他只做了五年所长,好像是主动请辞卸任了。在这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老余收拾“文革”的残局,拨乱反正,重整旗鼓,组织带领我们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开创了在当时全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里称得上辉煌的业绩,开辟了一个个新的研究领域,承接并完成了一项项新的比过去更出色的任务。我们所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国家教委和上海市等各个方面的若干项研究课题,撰写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西欧各国经济、欧洲共同体、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国际比较经济研究、欧美各国政府机构、世界大公司大银行以及战后国际关系史等八个系列的数十本专著、译著以及教材和研究报告等科研成果,其中不少受到有关方面的褒奖,创办的所刊《世界经济情况》和所系合办的《世界经济文汇》日后都被评为世界经济类全国核心刊物。

我清晰地记忆起老余非常重视学风建设,带领我们努力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研究世界经济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相结合,做到“洋为中用”。正是在他的领导下,我所在对战后工业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较早地也可以说在我国学术界首次提出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速度超过战前任何时期”的观点,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在全国产生较大的影响;我所还较早地提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某些经验可供我国借鉴的看

法,并受国家体改委的委托,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做了有益的基础调研和呼吁呐喊工作;我所在研究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跨国银行的基础上,对刚创办的特区经济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调研,比较早地提出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也要在海外进行投资,建立海外公司的观点,专门撰写了上海举办海外企业的建议报告。这一系列有助于复旦世经所扬名全国的业绩,老余的领导无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我清楚地记得老余作为所领导对我所开创欧洲共同体研究所给予的特别支持。大概在1977年末,老余思考对所内研究组室进行重新调整改组,倾听意见,同我们反复商议。记得有一天我向老余谈起西欧是我所研究重点,能否在西欧国别研究的基础上加强西欧综合研究,是否可以组建一个专门研究欧洲共同体一体化的研究室,实现经济与政治紧密结合,重视一体化理论和体制的探索调研。令我极其兴奋的是老余竟很快拍板决定叫我负责组建欧共体研究室,就这样在老余高瞻远瞩的领导支持下,全国第一个专门研究欧共体一体化的研究室就正式诞生了。此后几年里,我和周建平、戴炳然、蒋三铭四人一头扎进欧共体调研埋头苦干起来,撰写、翻译和编辑了欧共体系列多部著作,并创办了《欧共体资料》这一专题特色刊物(该刊坚持出版至今,已更名为《欧洲一体化研究》发行全国),后来胡荣花又加入我室,我们一起为欧共体研究在全国领先并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做出了较有特色的成绩,我室因此被评为复旦大学先进集体。每每忆及这件事,我们总是想起老余对我们的领导、支持和关心。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老余不仅是一名有远见胆识的学术领导人,而且还是一名身体力行讲究务实的学术带头人,欧共体经济研究室建立以后,他积极参与具体科研工作,亲自撰写论文多篇,亲自领头申请中标“六五”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课题(该课题成果于1989年以《欧洲共同体:体制、政策、趋势》专著形式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不担虚名亲自撰写了其中

两章并参与全书统稿),他亲自赴波恩参加欧共体经济国际学术讨论会,还应邀赴意大利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院作过一年的访问学者。从以上事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老余真是世经领域一位务实求进的学者型领导人。

此外,老余在领导世经所工作中,还重视开展国内外学校交流,邀请诺贝尔奖得主舒尔兹教授等著名学者前来讲学,他在培养中青年人才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还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的组建操劳筹划,记得正是老余全局考虑调送我所多人包括骨干学者到世经系和人口研究所工作,并担当领导职务。

正是由于在老余的领导下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短暂几年里作出了交口称誉的科研业绩,从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创科学的春天推动世界经济学界、西欧学界创建全国学术社团时,使得我所以占据突出的地位。老余作为复旦世界经济学科的代表人物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上海和全国多个学会的主要负责人。1979年11月上海世界经济学会正式成立,老余作为学会筹备组主要负责人为学会成立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从起草学会章程到学会组织机制运行的设计,在成立大会上老余当选为上海世经学会副会长,分工负责学会学术活动的筹划和组织工作。1988年1月起,老余在上海世经学会第二、三两届理事会上都被推选担任会长,直到1999年11月才从会长职位上卸任,但仍被推举为上海世经学会名誉会长。1980年4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老余代表上海世经学会领导并承担了繁重的筹备工作,会上他被选为中国世经学会副会长,几年后他主动请辞退居作顾问至今。我还清晰地历历在目的是由复旦世经所发起于1978年12月在上海衡山饭店召开全国西欧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老余亲自领导了研究会筹组活动,并在大会上当选为会长,我所因在西欧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和雄厚力量还被大会代表认定成为中国西欧经济研究会的合作单位,我被委任为研究会的秘书长协助老余承担

西欧研究会的日常事务工作,其后中国西欧经济研究会演变为西欧学会进而更名为中国欧洲学会,我所一直是该学会的支柱单位。1984年11月中国欧共体研究会在我所倡议下成立,老余任会长11年之久。以上情况足以证明老余在我国世经学界和欧洲学界的声誉和地位,表明老余不仅在复旦、在上海、甚至在全国世经学术领域中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老余是我国世经学界中一位知名的学术工作组织者,更是一位成就显著务实求进的学科带头人。我们从这次编辑出版他的文集《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中就可以了解到他学术涉猎的领域之广,思考钻研之深,理论联系实际,把世界经济研究探索紧密深入地结合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上来,做得那么有思想理论深度和现实参考价值。老余在几十年学术生涯中担负过一些单位的领导工作,他为工作和形势的需要,曾不断转换学术研究领域,身体力行地做了不少新的开拓性的科研工作,肯定有更多论著,看来汇集在这里的仅仅是老余在其学术生涯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成果的一部分,然我想这真可谓窥豹之一斑也。

在余开祥教授八十华诞和他的文集出版之际,我个人高兴之余作了思索回忆,此文内容只是东鳞西爪,也可能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唯一心意是借此表达祝贺之情,衷心祝贺老余健康长寿,学术生命长青永在。

2002年6月21日

凌晨1时许

余开祥教授：一位务实求进的学术领导人

刘同舜

在余开祥教授八十华诞和他的文集《中国改革开放和世界经济》出版之际，我作为和他共事三十余年的同事，深深觉得老余——我们大家都这样称呼他——是我遇到的一位务实求进，很有特色的学术领导人。几年前，在庆祝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的一次会议上，他的老友、国际政治系陈其人教授讲了一番很令人感动的話，谈及老余数十年在复旦担负的各项教学和科研工作等，说他堪称“复旦百科全书派学者”。听到这句话，几令我当场拍案叫绝。我心目中这位可敬的学术领导人，他的学术专长，用这句话来概括，真是太贴切了。

我是1955年进复旦的，在新闻系讲些国际问题基础之类的课程。1963年底，校领导将成立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由余开祥负责具体筹建，要我去他那儿报到。报到时，方知成立这个机构“来头很大”，被“相中”者，应感“光荣”等等。但“光荣”了没多久，文化被“大革命”革掉了，研究就此中断。直到老人家决定打破中美僵局，尼克松访华前夕，我们这批在干校“洗心革面”的“老九”，才逐个“上调”，被“使用”。我被“传呼”上去，好像是参加《尼克松传》译文的校对。老余的“罪名”比我大，可能更晚些用其“一技之长”。再往后些日子，大致在有些出版社编译出版了一批外国史地著作前后，与建所情况相似，亦来了一项“来头很大”的任务，要研究所

参与编写以国际关系为主的战后世界历史。这次,老余也已“解放”,便要他负责组织、协调该书的编写,我也跟随他参与此事。前不久,《读书》杂志发了一篇南开大学任东来教授的学术评论,题目叫做“纪念一项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学术事业”^①,说的就是从1975年7月出版第一册直到2000年3月第十一册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这套多卷本。

任东来先生这篇文章,对《长编》做了严格的学术批评,不过,溢美之处,还是不少。由于余老在《长编》出了第五册之后,回复旦出任改建后的世界经济研究所领导,不再过问出书事宜,而一至五册在当时属“内部发行”,压根就不提作者和主编的名字,故在任的文字里没有提到余老。我要说的是,任文称赞《长编》“选题精良”,有多少个“堪称第一”,以及“严格遵守了今天才开始引起学者广泛注意的学术规范”这两条,均出自老余的反复推敲和精心设计。他为《长编》选题,不知参考了多少中外文献,包括哈佛当年为编纂世界史战后部分所开列的参考书目,他都尽可能搜来,仔细阅读。为统一规范注释,提供完整的版本信息,他还规定专人负责校核,方便读者查找,并要求角注起到参考书目的作用,除档案史料外,凡专著力求包括有影响的代表作。

使我佩服的,是老余组织、协调这项工作的学术领导才能,他那“百科全书派学者”的专长和学识,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参与这项工作的,除我之外,大都一流人才,有些还是历史、经济、政治学科方面的专家。尽管彼此都明白自己当时的“身份”,但一涉及学术,“本相”不免暴露。老余事先周密的框架筹划,明白无误的体制规范,以及尽可能提供有关资料信息等,使大家做到各尽所能,取长补短,不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在政治高压的这段日子里,

^① 任东来:纪念一项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学术事业,《读书》2002年4月,第127—133页。

前前后后的有数十人之多，躲进小楼成一统，编写被任东来先生称之为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这部“以史料为主体的资料”。

“文革”结束后，老余回校忙于改建世界经济研究所。这时，参与《长编》的校友诸公都返回各自原先岗位，我便把编纂工作带回复旦。经与老余商量，在研究所挂了块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室的牌子，继续编纂第六册以后的《长编》。这时只剩下这个研究室五六个人了，还得做些研究生的教学工作，承担些别的研究项目。但我们仍留恋当年单打一的做法，不免和身为所长的老余，有些小摩擦。不过，他还是大度地宽容了我有时施展的“调包”伎俩，我很感激他。就在这一段时间里，老余本人满腔热情地投入改革开放，提出中国经济乃世界经济重要一块。改建后的研究所已非建所初期只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研究所了。与此同时，他还非常前瞻地建立了欧共体研究室，率先研究这个当时在国内还不甚注意的经济体。收入本文集的那篇长文《欧共体经济社会政策的协调和困难》，便是一例。

老余在复旦一直是所谓“双肩挑”干部。从解放初的政治课教学小组、马列主义教研室到后来的政治系再到世界经济研究所，他就是这个组、室、系、所的领导，又是教学和科研的“骨干”。他在我的印象中，他的那个“领导”，似乎都是副的，却又是负实际责任的，只有“文革”结束后的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才是名副其实。个中原因，我也猜不透。但他这个经历，使我更钦佩他的学识专长。

余开祥教授离休后，仍十分关心《长编》，见到我便问：“编到哪一年了？”我只会顾左右而言他。因为我遇到的困难一是钱，二是人，尤以人最为棘手——谁愿意干“为人作嫁衣裳”的事？穷尽多少文献，才写出（还是编写）万把字的“资料”，况且《长编》这个名字“无学术气”，做这种事，岂非自贬身价？然近来似有转机，复旦学中居然有想干这“傻事”的，他们正在商量。老余听了一定会高兴的。

我的恩师余开祥教授

陈其人

余开祥教授 80 周岁了。为了庆祝他的华诞,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朋友编辑了他的文集;并希望我写点什么。对我,这是义不容辞的。

我在一篇类似学术自传的文章中说到:使我的生涯涂上一学术色彩的,是这三个人:我的外祖父;王亚南老师;余开祥老师。外祖父是终生举人,因废科举而断了仕途,便成为“教馆先生”,以教书、育人、著文为乐,我好生羡慕;王老师是著名学者,“以中国人的资格”研究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对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中国社会经济史及其政治上层建筑史、经济学说史的研究,无一没有创建,更难得的是,经常发表论著,针砭时弊;自从当中学生时听了他的报告,再考取了以他为主任的经济系之后,我就上了他的经济学之舟,再也没有下来过;余开祥老师,由于他的提携和培育,我虽经周折和苦难,但终于能在高等学校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即最终实现了我的宿愿。

我是 1949 年 9 月或 10 月认识余老师的。当时,我通过了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的初试,正进入复试(口试)。主考人是王寅生,副的是余老师。王曾任《文汇报》“中国农村”的主编,我的几篇处女作,作为大学毕业论文的阶段性成果,就在那里发表;王对此有印象。他鼓励我考取后,要多努力,作出贡献。余老师大概

听进去了。复试我是通过了,但由于在中学任教,工作实在忙,来了几天,校方不放,就无法再来(如果是现在,就没有问题了),只好申请保留学籍一年。1950年夏,我一面办理辞职手续,一面申请复学。经济研究所领导要我加考统计学。我是个偏学的人,什么高等数学、统计学、会计学等必修课,都没有好好地学过(使我至今不忘的是:有一年,会计学 and 西洋经济史同时学,由同一教师任教,他知道我不愿读会计学,便说:你就做一个练习吧,我让你及格:反倒鼓励我偏课。他显然不主张大学生每门课都考5分;我也是这样),怎能应试?当我失望时,经研所毕业留校工作者(可能是赵安东)来信,说拟用调动工作的办法,把我调到经济系任助教,但工资因此将减少很多,问我是否同意?我当然同意。这样,我就到经济系任系主任朱伯康教授的助教。来系半年,在两个助教中,我优先被派到北京进修一年。这两件事,我事后了解,都有余老师的功劳。

进修回来后,我确实“努力作贡献”:三人合写的教材,几乎全国使用;为了对私有工商业改造的需要,做报告,写文章;连续三年,每年出书两本……但是,晴天也有霹雳!在1958年的教改中,我被打成与南共修正主义纲领相呼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形容为其貌鲜艳其汁极毒的“罌粟花”,被调到附中“教书”。——附中何罪,竟成为我和“分子”的劳改地!

在附中,我认为没有错,于是,“皮焦肉烂心不死”,正业之余,还念念不忘经济学:竟继续批判“亚当·斯密教条”,偶有收获,便写成文章,用笔名“其人”在《光明日报》发表。一天,余老师在车站与我相遇;竟走到我身旁轻声问:“是你的文章?”真是别人连躲都来不及,余老师却……我实在找不出用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的词汇!

附中三年。一天傍晚,附中领导找我,说大学部有人要见我。原来是余老师!他说:要“一风吹”:过去的批判不谈了,你应回

大学部工作；但是，回经济系，会有不愉快的回忆；还不如到政治系去；他就是代表该系系主任吴常铭来的。我答应了。从此，我就在政治系及其后的国际政治系工作。但是，由于是“一风吹”，我确实不知道在经济系工作时，教学和科研，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当时，先后要我准备空想社会主义和政治学说史这两门课。当时我就认为，既然备课，就要写，既然写，就要由别人评价，换言之，就应发表，以便让社会评价。也由于“心不死”，我还是投稿；只是往远处投，为的是不让人知道。谁知余老师翻阅的报纸甚多，我那篇《费边派的“滑进”社会主义论》，他还是知道了。但是，他不像当时的“白专道路”批判者那样，不仅不批判我“又走旧路”，反而鼓励说：应该多写！由于有此鼓励，我不再怕“草绳”，就越写越多，书籍中就有“斯密的《国富论》是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学百科全书”的话。这招来文革中教师的批判：“交代吹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阴谋和背景！”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余老师能说出这样的昏话吗？我何尝不想“吹捧”无产阶级经济学家，可是，18世纪中叶，有像斯密这样的无产阶级经济学大师吗？马克思难道不是曾以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为师吗？——这是一个使人笑不出来的笑话。不过，我后来在餐桌上说给同行们听，他们还是喷饭了！

1964年春，新成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余老师被调去主持日常工作。趁许多新人调进之机，余老师用心良苦，也将我“塞”进去。我天真地认为，从此可以“重操旧业”了。但是，“形势比人强”，我很快就被撵了出来，回到国际政治系，以“加强建系工作”。后来得知：余老师因此背上“用人不问政治”的罪名。

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同蹲牛棚，同被劳改，这不必说。要说的是：“用人不问政治”，只因这一点，余老师就有一专场挨斗会。我拖累了余老师！

文革结束，余老师大概还没有吃够苦，还不汲取教训，不怕“七八年来一次”，还想调几个人到世界经济研究所去，据说，其中就有